【警世恒言】

中华民族一直是在压力之下成长、成熟、发展壮大起来的。

国货当自强,这一次轮到芯片了

傅子恒

中兴事件仍在发酵，有一些内幕似乎还处在扑朔迷离的半遮掩状态，最终的谜底似乎还有待揭开。但无论如何,在中美贸易争端的背景之下,这一事件在这一时点爆发，其冲击显然会让人们联想到两国的贸易冲突与争端升级;也似乎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由美国基于其国内贸易逆差争端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延烧到了技术竞争、技术控制与反控制这个层面了。美国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科技领域对中国公司祭出重手，其对中国相关行业、相关公司的影响都是巨大而令人震惊的。

影响首先在于，它暴露出中国在一系列高端基础产品、核心应用技术领域受制于人的严峻事实，这是整个中国民族工业的软肋；而这一次,在这一软肋上,我们的确是被人家打痛了。它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中美两国,在许多关键重要领域,还存在着巨大差距。

芯片是什么？它是集成电路的具体载体,它是半导体元件产品的统称,因其承担运算和存储功能，因而是电子设备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其应用范围覆盖了军工、民用的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可以说居于现代几乎所有核心产业命脉的地位。

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根据相关统计，中国芯片产业的对外依存度高达90%，尤其是众多高端产业以及具有广泛市场应用领域的重要芯片产品，几乎完全依靠国外进口。2017年全球芯片行业产值接近4000亿美元。作为国内第二大通信设备制造商的中兴通讯2017年实现销售收入1088亿元人民币,其中国际市场业务比重为57.8%。美国此次对中兴的禁令可以立即令其境外业务基本归零,同时将严重挫伤其国内业务,并将导致与其具有业务关系的其他公司的损失。

中国在高端核心科技产业存在巨大差距与受制于人的事实，还有互联网技术应用领域。有人说美国对中兴通讯、对中国企业放了一颗“高科技原子弹”,此言并不过分。美国的一纸技术禁售令就可以使一个经历二十多年积累发展起来的民族标杆企业损失巨大，足见技术壁垒差距背景下强者对弱者打击带来的巨大杀伤力。

现代竞争最终是科技的竞争,中兴事件再次揭示这一事实。尽管是契约经济，现代市场竞争也不可否认地依然具有丛林性质，无需进行意识形态方面的口水争论，无论从国家还是企业层面,要很好地生存发展,就需要持续地创新进步，在核心技术领域占据一席之地，才能在国际竞争体系中占据不那么被动的地位，也才可以正常地参与国际分工与国际竞争。

由此,中兴事件引发的反思在于,企业当自强,国家当自强,警醒之中需要正视事实，继续补课。对于国家而言,需要持续推进战略产业升级,完善自己的工业体系，在最重要的核心与高端科技、应用技术领域,尽快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这需要有时代紧迫感,但同时也应当清醒认识到，科技进步远非一日之功，而且越是高精尖的产品、产业,越需要时间积累——技术、人才、市场协作、体制建设等等方面的积累,技术进步过程中不能盲目躁动,也不能闭关锁国，需要继续扩大对外的开放交流,向先进学习,需永远虚怀若谷。

中华民族一直是在压力之下成长、成熟、发展壮大起来的。我们需要一如既往地在压力之下保持这种韧性。国货当自强,这一次轮到半导体芯片行业补课了。

（作者系资深市场研究人士）

【思想如虹】

长久以来，企业内刊被赋予的功能仅为展示或点缀，并且就展示功能而言，也是有限的。

华为的“两报一论坛”

马虹玫

企业内刊,顾名思义,就是企业内部自办的，不具备公开发行刊号的报纸或杂志,对外展示企业形象,对内宣教沟通。内刊通常会展示公司业绩、重要会议、老板的批示发言;部门和员工风采也不能少,突出员工忘我工作,以公司为家,部门团结协作等正能量。稍微有点规模的企业,都喜好办份内刊，对外交流时，可谓一册在手,成果丰硕。

通讯业巨头、世界五百强企业、总部位于深圳的华为公司，它的企业内刊又是怎样的呢?

华为有“两报一论坛”,两报分别是《华为人》与《管理优化报》。两份都是报纸形态,均为四版。这两份报纸均早于2000年前便已成形。老华为人还记得,当年出去见客户,带上一份《华为人》，宣传公司顺便也给自己长长脸。可以说,这份四版报纸还承担着推广企业形象的功能。《华为人》名副其实,倾向于让华为人讲述自己的故事,身临其境,真实刻画,以小见大,有人文内核。

除了两报外，华为还有一个网络论坛——心声社区。它被誉为“华为的罗马广场”,于2008年6月29日正式上线。华为员工自动享有该社区账号,可实名或匿名发言。外部人士以访客身份登录社区，能浏览部分开放的频道和内容。据统计已有98%以上的在职中方员工访问过该社区。2014年8月，心声社区全新改版,2016年点击量超过四亿次。心声还推出APP以及微信微博等运用。心声社区曾经整合了原华为行政之窗上的征婚交友、跳蚤市场、求租招租等信息,但仅对内部员工开放。甭管资深非资深的华为人,应该都有一种体验——帮亲朋好友到心声发布征婚交友贴，至搬家处理的二手家具等等，在早年的心声社区尤其抢手。心声社区除了实用性功能以外,还设有一个“自我批判区”,任正非认为，即使大家穿着马甲在上面胡说八道,也是提意见的一种渠道和方式,华为接受大家的评头论足。

华为的《管理优化报》(以下简称《管报》)，则是一份专门对自己内部“下手”的内刊。它承载着诸如华为内部管理优化、管理进步的批判性功能,而正是这一点，让它在浩如烟海的企业内刊中脱颖而出。2015年,《管报》刊登了一篇名为《一次付款的艰难旅程》的文章,直指华为内部的财务审批流程太复杂、财务人员经常设阻力等。该文引来任正非关注，发信怒斥华为财务团队“颐指气使”,并以总裁办电子邮件形式，发给华为董事会监事会和全体员工。类似这样的案例还有不少。由此可见,华为高层对《管理优化报》反映问题的反馈速度与重视程度。有时候该报整版都是关于自我批判,《管报》绝对是企业内刊中的一股珍贵的清流。

《管报》用稿要求,此处摘录部分供读者参考。该报关注的内容是,各部门和各环节存在的问题或值得推广的经验,但主要是曝光问题,如能加以探讨或提出解决之道最好。对所反映问题进行真实客观的描述,不偏激,不追求观点的新奇特。符合公司的政策、文化导向。主题不宜过于宏大,要结合本职工作、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来谈。《管报》不要大鸣大放的文章,而要小鞭炮(小鞭炮之说形象生动贴切)。其用稿原则是,原文照登,文责自负。同时也保护作者的隐私,为作者严格保密。

长久以来，企业内刊被赋予的功能仅为展示或点缀，并且就展示功能而言,也是有限的。大部分企业内刊,只可歌功颂德，不可建言献策更不许直言不讳。梳理华为内刊的功能与办报宗旨,或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除了作为企业文化的有机组成和承载工具之外,华为的“两报一论坛”还具备服务企业经营管理的工具性功能。而这一条，也可为企业内刊的存在挖掘更多价值,探索出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什么时候,企业内刊能改变“扔了可惜,放着占地,员工不看,客户更不看”的尴尬境地呢？从华为的“两报一论坛”中,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发。

（作者系深圳自由撰稿人）

【念念有余】

香港是普通劳动者被压榨的城市。这个群体的命运被套牢了。

香港老人

余胜良

一个多月过去了，还常常想起在香港港岛北角地铁站200米左右那个潮汕米粉小店,晚上11点多了,店主人一边往嘴里扒饭，一边警惕地盯着路人。进店门两侧隔起来两个玻璃房工作台,他在右侧那个,空间狭小,只可以站着转个身子。

煮好的牛肉摆在案头，还有各种已经加工好的熟食，客人点了菜传到他这里，只需要切好摆在可快速加工好的粉、面上即可,切菜时,他身子有节律地下压,就像有鼓点在催着他。

他头发花白,60岁以上，认真工作的模样就像这个工作是他的宗教。

在香港会展中心附近的君悦酒店门口,两个老人穿着制服,用小便笺本子记着顾客要达到的地方，和出租车司机沟通,然后快速调配人车,动作娴熟态度专业，显示出这个工作给他们带来的自尊。

在香港，经常会看到上了年纪的大厨、上了年纪的传菜员,要说和内地不一样的地方，那就是他们都非常干净,干净的衣服、干净的脸、干净的神情和动作。

香港那些街头小饭店，只要能存活下来的,就有独特之处,香港发展旅游业,游客旺,有些老牌饭店无法支付租金倒了下去，能生存下来一定是经营能手,比如上述这家店,价格不贵,粉面之上覆盖的牛腩块又非常之大,为我所见最大,估计40倍于内地兰州拉面之牛肉面的肉量,价格还不到40港币,吸引了很多常客。还有一些店面为了提高营业额,晚上两点也不休息。

香港租金贵，但人口也集中,工作、生活的范围有限,店面生意也容易好,顾客多了才能赚回来租金,但同时租金也已考虑了顾客多这个因素。

从深圳到香港旅游的，常常觉得香港令人紧张,等回到了罗湖关口,就长松一口气,一下子气定神闲。二三线等城市到深圳的也会有这种感觉。

在香港,店家不能松懈,如果稍有怠慢,就会被别的店家淘汰,或者被外籍劳工替代。晚上12点多,在北角一个菜市场开来一辆大货车，两个外籍劳工从车上往下搬货物。东南亚多少物美价廉的劳工，他们在香港获得的收入很有吸引力。还有北角地铁站C出口不远处，一个只有4平米左右的小店面,店主人来自泰国,提供简单的宵夜,傍晚开业到凌晨收摊。在这里,别人愿意更低价格和你竞争。

在中国见不到这么多职业老人,大城市里没有老人的工作空间，大多只能做清洁工，连清洁工也有年龄要求。广场上也有一些老人在跳舞,即使在全世界范围内，他们也是非常幸运的一群,他们为国家做了贡献,可以享受国家带来的福利。

在中国有一个庞大的退休群体,或者是国家公务员，或者是企事业员工,或者是普通的工人阶级,退休后收入还在蹭蹭往上涨，比还在工作的人涨得还快。这个群体年龄也不算大,依然很有活力,忙着旅游和社交,过得很滋润,还能资助一下子女。

中国劳动力群体庞大，交社保人数和金额都在提高，缴纳的部分给现在退休的人发工资，现在交社保的主力退休之后,领退休金的人多,贡献退休金的人少,就没那么幸运了。

中国吃苦的老人们在农村。我的外公外婆,都已经80多岁了,还要自己做饭,还要劳作,帮亲人摘花生、摘辣椒等。但他们不用像香港这些老人那么忙,他们农忙季节才会这么紧张,平时还是神情放松的,节奏缓慢的,他们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不用算细账。反正以后还有农活可干，不会富但也穷不死,不会有被社会淘汰的切肤之痛。

香港是一个奋斗者的城市。如果不努力就赚不够房租，或者还不起房贷，人们赚的钱源源不断缴到房东手中,从这个角度看,香港是普通劳动者被压榨的城市。这个群体的命运被套牢了。同样在北角,看到许多疗养院,这是老年人去的地方，就跟电影《桃姐》演的那样。人们在这里赚钱,也将青春埋葬在无休止的劳动中，连中年和老年也要被埋葬,一生无休。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

【缘木求鱼】

“杀威棒” 制度能延续上千年，说明这不但是一个很有效的制度，而且也是一个因有效而特有生命力的制度。

杀威棒

木木

一部《水浒》,不但“投降”二字写得好,而且还写活了一支“杀威棒”。这支棒子,出现的次数特别多,耍得也特别活灵活现；许多重要角色都和这支“杀威棒”发生过关系,宋江、卢俊义、林冲、武松、朱仝……

据牢头儿们说,这个“杀威棒”制度,是当年“太祖武德皇帝”定下的规矩。不过,有好事的专业人士考证,宋太祖赵匡胤的开国年号是建隆，虽然后来心血来潮改过两次,但一为乾德,二为开宝,就从来没拿“武德”配过年号。后来,匡胤帝在玩儿过“烛影斧声”的小游戏之后就驾鹤西归,谥号“英武圣文神德皇帝”,虽然其中有“武”、有“德”，而且他老人家也确实是凭武力发动政变当上皇帝的,但当时的小卒、小民，似乎不应该如此简呼自己的先帝,忒有点儿无礼了。

当然也有专家认为，唐高祖李渊当年定年号“武德”,因此,“太祖武德皇帝”应该指的是李渊,所以“杀威棒”制度应该是李渊的杰作。为此,专家还举了《说唐》里的情节做注脚,说早在唐朝,“贼配军” 就享有杀威棒的待遇了。不过,李渊的庙号是“高祖”,与“太祖”多多少少还是有那么点儿区别的,对特别注重礼仪的古人而言，似乎不应该把两个“祖宗”搞混喽。

就此而言,《水浒》中对“杀威棒”制度出处的记述,还是有点儿瑕疵的,当然,这个“瑕疵”也很有可能是作者刻意为之,故意糊涂着写,既省了费时费力地考据,又能“一‘棒’打两朝”,顺带着还能含沙射影地揭刺一下 “当朝”。这倒也有很大的可能。但别管怎么说,“杀威棒”制度被安置在《水浒》的诸多场景中,倒是毫无违和之感,浑然天成。

别管是唐朝的制度也好，宋朝的创举也罢,抑或是当朝的安排也行,反正这是一个大家见怪不怪、习惯成自然的“制度”,那就一定有其现实的合理性。被打的,自认倒霉,打了也就打了;打人的,也心安理得,打了也就打了。当然,想不被打也行,只要使些银子即可,而且所费不多,关节处“五两”就够,明码标价,公道得很。对双方而言,简直就是一个双赢的不二之选,前者免了皮开肉绽之苦，后者也省了气力、免了心肝之火妄动对健康的损伤,还能赚点儿零花钱。

正所谓“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哪能让尿憋死。在这一点上,千年前的古人在今人的眼里倒都个个新鲜活泼得很,在具体的操作手法上,居然没有一丝半点儿的古董气。你看啊,背地里使完银子，明面上也不能让制度为难,只要讨个软儿,告个病假,“杀威棒”虽然绝不能免,但却能“先寄下”,至于什么时候再打、乃至怎么打,那就是更灵活的后话了。真是个皆大欢喜的结果。

这种人情、制度兼顾的灵活性,当然还有更妙之处,即角色可以互换,有朝一日“贼配军”突然发了迹,登堂入室当了官儿老爷，当然也就天然有了让别人也尝尝“杀威棒”的权力,而这个别人，或许还是那位昨天高高在上打了或想要打“杀威棒”的老爷呢,那似乎就更解气。既然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制度——或者说游戏也行——角色互换之后,新任的“贼配军”,当然也没什么好怨天怨地的。

“杀威棒”制度能延续上千年,说明这不但是一个很有效的制度，而且也是一个因有效而特有生命力的制度。不过,也用不着为千年前的老祖宗格外自豪，类似的制度全世界哪儿都有,人与人之间管用,国与国之间也屡试不爽。就此而言,在这个世界上,人就都差不多;即使有什么人的想法儿、做派让人看了犯糊涂，但只要按了人情世故琢磨琢磨，肯定也没什么高深之处;想明白这一点,应对之法那就多得是。而人的悲剧性特征,也因此表现得格外凸显。

（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